

一、忠诚爱国 与时俱进

——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1995)10月7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他曾说希望能活到一百零六岁，因为到那时将进入廿一世纪，他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老人，并能亲眼目睹祖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实现第二步的目标（即全国人均达到小康水平）祖国将更加富强昌盛，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他将是一个最快活的老人。他说这话的时间约在1984年，当时他虽已89高龄，但身体仍很健康，对自己的生命力抱有信心。我曾问他：您怎能使自己估计的寿命实现呢？他说：这只是我的愿望，我又不是算命先生，怎能预先知道自己的寿命呢？但是有没有这个愿望是不一样的……不料在他90岁那年，他长途跋涉，访问了我国南方的广州、深圳、珠海等开放较早的特区和城市之后，由于劳累过度，返京不久，突发心脏病并发肺炎，急送医院抢救。在抢救过程中，他数次心脏停跳，最长的一次停跳了18秒钟。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竭尽全力，冒风险给他安上了心脏起搏器，终于转危为安。此后他在住院的四年多中，顽强地同疾病抗争，同时依然关注着祖国的四化大业。住院期间，直至逝世，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每当我出差北京顺便去医院探望他时，他总是说：我很好，你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必多来看我，这里医院对我照顾得很好……等话。1985年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40周年纪念

会，他虽因病未能出席，但作了书面发言。会上彭冲同志代表党中央讲了话 他听了录音后 深有感触地写了一首诗：

莛萝附乔松 生死相与共；
同建千秋业 前路自从容。
百折不知返 恢恢见大功；
我年尚未老 奋发犹若童。

这首诗表达了他在病中的精神始终是乐观的；表达了他对党的信念及民主党派与党的亲密关系。

以上作为这篇纪念文的引子。下面我将按我划分的各个阶段 回顾他的一生。我将父亲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 即：（一）救国之志（二）救国之路（三）建国之道。救国之路又分三个小阶段 即：（1）实业救国。（2）抗战救国。（3）和平、民主救国。建国之道又分为四个小阶段，即（1）解放初期。（2）私企改造及一五计划。（3）全面建设的十年和“文革”十年。（4）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的十二年。

对于父亲的一生 已有《胡厥文回忆录》出版发行。这本书是由我二哥胡世华等三人受民建中央委托整理出版的。这本书系根据“父亲生前写的一份自述稿 结合父亲发表的文章、言论、有关专访文章以及父亲生前友好提供的材料 加以核对补充。编写过程中 父亲已双目失明 只得把一些重要的段落念给他听 提出问题，征询意见，以求真实。在用词上也尽量采用他的原话。”^① 因此这本书能真实地、较全面地反映出父亲一生的主要经历和言行。本文所述的史实基本上是根据《胡厥文回忆录》一

摘自《胡厥文回忆录》中的“整理后记”。

书,但也有一些是我亲闻亲见,而在“回忆录”中未提及的。同时在取舍时,均围绕“忠诚爱国,与时俱进”这个主题和文章分段的内容来编排的。俾能更集中、更精炼、更简洁地阐明父亲一生中最值得纪念、值得学习、值得继承、应当发扬的精神和思想。

第一章 救国之志

父亲出生于清光绪廿一年(公元1895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他已经14岁。父亲3岁即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和大哥、表哥表姐们一起读《四书》、《五经》、《左传》等。他年龄最小,但成绩最好。9岁时进嘉定第一高等小学,在那里他遇到了第一位知心的教育家——周世恒校长,周校长知识渊博,精通琴棋书画,善诗能文,当时学校里请不到教唱歌、体操的教员,就自己学会风琴和体操,亲自任教这两门功课。父亲十分敬佩周校长的才识,更敬佩他的为人。在小学期间,还有一位博物老师李石鲸,李老师在课余经常带他们到旷野、古庙、田间和水边游玩,观察植物的花蒂、叶茎,捕捉各类昆虫,做成标本,讲解肥皂、火柴等产品的制造方法以及配制碘酒、制作荧灯等,把他领进了学科学、爱科学之门。因而使他从小就懂得了科学可以强国富民,心灵里播下了实业救国的种子。少年的父亲又十分好动,十一二岁时,每天一放下书包就和小伙伴们到四座城门下演习打仗。一队攻城,另一队分守城门,两队均有指挥、军师、间谍等。父亲喜欢攻城,常被推为指挥,把从《三国演义》里学到的兵法加以运用,经常获胜。

父亲14岁时由嘉定县保送到太仓州州属中学学习,在中学学习时,特别喜爱数学课,成绩特别出众,全校闻名。同时还特别喜欢踢足球,一直保持到升入大学以后。由于父亲学习成绩好,

又热心为大家办事，加以身体强健，头脑聪颖，同学们一致推选他当班长，连选连任直至毕业。

父亲的性格刚强、正直，好打抱不平。在辛亥革命的前夜，进步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反对清朝帝制，要求民主共和的思潮。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影响下，太仓中学的一些青年教师秘密组织起来，进行革命宣传等地下活动，他们吸收父亲参加，单独给他讲述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并要他严守秘密，参加革命宣传活动。还常借给他一些“禁书”阅读，使他知道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嘉定三屠记》这本禁书更使他激动，激励他为推翻帝制而奋斗。秘密活动除了传阅进步书报、宣传革命道理外，还把清政府的反动腐败、宫廷的奢侈荒淫，以及官吏的卑鄙无能等史实编成话剧，秘密演出。这些活动，使父亲进一步认识了清朝政府的罪恶和封建帝制的反动本质，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十分向往。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作为首届毕业生，完成了中学学业，面临了上大学选择专业的关口。在当时的爱国思潮影响下，他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国家强盛。上中学时，列强的火车、轮船、飞机、大炮给他的印象很深，总觉得没有这些，国家就不能强大，因此他决心攻读机械制造专业，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19岁的父亲在深感外侮日亟，国弱民贫，必须振兴实业，方能救国的认识下，考入了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

在北京学习期间，正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横行，官僚政客四出活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袁世凯为了要称帝，不惜丧权辱国，签订了卖国的“廿一条”不平等条约。这一切使他感到，做官、搞政治的都是些卑鄙无耻之徒，而所谓“政治”无非是为自己争权夺利。因而他对这些一概没有兴趣，更坚定了实业救国的理想，认为只有办实业，发展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中的工业之母——机械工业，才能制造飞机、大炮、轮船、兵

舰 才能富国强兵 赶走帝国主义。

在大学的四年（一年预科 三年本科）中 他反对死读书做分数的奴隶。他认为，在学习上应该注重对课程的消化和理解，要能举一反三地应用 才能学有所得。课余时 他学习写诗、作画和练习书法 还经常和大家一起踢足球 打网球 调剂心身。这样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愉快。同时学校里的江苏同学，为了加强联谊 互相帮助 成立了江苏省旅京同学会 大家推他为会长。他对解决贫困同学的救济问题十分重视，积极地为贫困同学向南京江苏省部申请补助费，不足时，发动大家互助，同学有困难都愿找他商量解决。

1918年夏，父亲结束了大学四年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自立的人生道路。当时大学毕业的学生不多，均自谋职业，北京高等工专的毕业生作官的机会很多，不少人去当县长或在铁路上谋取一个肥缺。父亲早就立下实业救国的志向，抱定宗旨，一不作官 二不执教 而要自己办实业 但为了学以致用 他决心到工厂去从工人做起。通过岳父沈恩孚的关系，经汉冶萍总公司经理李一勤的介绍，他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工厂。报到时 厂长按惯例让他任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之职 但他却提出愿当一名学徒工人。他说：他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缺乏实践，今后办实业很难搞好工作。先从实际工作中学得手艺，以便今后能更好胜任工作。厂长郑重地说：帮工程师月薪20元 厂里还供给膳食 而当学徒工 月薪才11.5元 还要拿出6元钱吃饭，你好好考虑吧！而他认为当学徒工可以放下架子学好手艺和技术 并且容易接触实际 不懂也好问 没有包袱 因而就到机械股当一名钳工。那时，钳工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工作时间达10小时 累得腰酸背痛 但父亲干得十分起劲 决心学好多手艺。一次 机械股股长巡查时 见父亲的钳桌上无人 就勃然大

怒。父亲小便回来后 他责问为什么不先向领班请假。父亲认为股长故意找茬 就顶了几句。领班告到厂长那里 要开除他。厂长决定把他调到化铁股工作。化铁股工作在高温下操作 劳动强度更大 每天要干 12 小时 还经常做夜班 但姓麦的股长对人很和气 他干得十分舒畅 股内有几位老师傅 技术十分高明 他们对他们非常尊重 交上了朋友 工作中互相教学 生活上喝酒谈笑, 与工人们相处的很要好 他们有困难都来找父亲商量 他们对厂里有什么意见也托父亲转达。父亲深深感到在劳动实践中 扎扎实实地向工人们学习, 确实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本领。

1919 年春节, 父亲回到家乡, 与母亲沈方成一起去看望岳父。岳父告诉他同济医工专科学校 即同济大学前身 里的机械、电器、木工三个实习工场的德籍主任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而被遣送回国 工场无人管理, 十分混乱 希望他能回来担负这项工作。他听后十分高兴 他想这正是锻炼自己管理工厂的极好机会 欣表同意。于是在岳父的推荐下 聘请他担任该校三个实习工场的主任。

父亲任同济实习工场主任将近两年。他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整顿纪律 健全制度。当时三个工场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 设备都比较新, 40 多名工人中有不少高级技工。但是由于管理不善 缺少必要的规章制度 工场工作十分松弛 大家有不少意见。父亲经过调查了解后 决定先整顿纪律 健全制度。三个工场原规定早上七点开工 但由于三个德籍主任和其他教职工一样 到八点钟才来 因此大家也不按时上班 无形中推迟了一小时 影响实习前的准备工作质量。父亲到任后 除了向大家说明作好实习准备工作的重要意义外, 制作了一个名牌箱, 由他亲自掌握。每天六时三刻他准时到场, 一到七点就把名牌箱锁好 凡迟到者必须向他说明理由 再由他开箱将名牌挂入。这样一来 谁准时

到谁迟到以及为何迟到均一清二楚。大家见主任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很快都做到了按时上班。只有电器工场的一名高级技工自恃奇货可居，以为主任是学机械的不懂电器，工作少不了他，不敢把他怎样，竟提出若要他七点钟上班就辞职不干。校长查清情况后，支持父亲整顿工场的做法，批准了这位技工辞职。由于这件事能及时处理，先礼后兵，受到工场的普遍拥护，提高了新上任又年轻的工场主任的威信。从此不仅上下班制度得到认真贯彻，而且在组织指挥各项工作中也更加得心应手。第二，接着父亲又着手解决工场内作私活的歪风。那时上班时做私活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但工人自己做，还给学校中职位较高的教职员做，用了各种材料也不付钱，长期得不到解决。为此，父亲专门打了个报告，指出这种损公利己的风气不可长，它大大损害了为人师表的形象。提出凡欲在工场做任何私人物品，必须经工场统一安排，不得私自委托工人制作，物品制成后，由工场按工料成本开发票统一收费。这一建议得到校长和全体教职工的同意。父亲深知要一下子实行工场做活收费的规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自己要做个样子。当时父亲正想制作一套机器工场模型送给嘉定教育馆陈列，在家乡宣传机器的知识，启发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于是就委托工场制造了一套模型，包括车、铣、刨、钻等各类机床，还有蒸汽机和锅炉，可用酒精烧蒸汽以推动机器运转。这套模型制成后，父亲首先带头照价付了款。这样，照价付款的规矩也就树立起来了。可是，有一次校长家中安装火炉，用了工场的工料却未付钱。父亲想校长是一校之长，全校教职员说话办事都看着他，假使校长这次不交钱，就会上行下效，刚刚建立起来的制度就要流产。父亲就写了条子去，要校长交工料费。后来校长向工场如数交了款。自此以后，在实习工场做东西不交款的事就绝迹了。第三，原来实习工场的任务，是帮

助同学实习，掌握初步的操作技能，不生产任何产品，所有经费由学校拨给。根据工场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父亲认为工场具备制造机床的各种条件，便大胆地向校方提出结合实习任务，制造德国精密车床的设想，实习结合产品制造，可丰富学生在设计、制图、成本核算、节约用料、降低工时和提高质量等方面的实际知识，又能增加工场的收入，逐步做到经济独立，节省学校开支。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校方支持，职工通过讨论也统一了认识，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四个月的奋战，造出了第一台德式精密车床。这是父亲亲手组织制造的第一台机床，工场生产了六台这种机床，创值 3 千余元。通过这一段实际工作，父亲对如何办厂有了初步的体会，感到自己基本上具备了办工厂的能力，决心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出一条实业救国之路来。

据叔父胡叔常的回忆，父亲在实习工场工作期间作过一首诗：天未破晓着征衣，踏雪提筐步如飞。为何冲寒浑不顾？只缘年少姓名微。时年约 24 岁，此诗表达了他当时的精神风貌。

第二章 救国之路

1921 年冬，父亲离开同济，开始了他的救国之路。从创办新民机器厂开始，直至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在将近廿八年中，他从实业救国出发，经历了创办实业的十六年（1921~1937），投入抗日战争的八年（1937~1945），参加民主运动的四年（1946~1949）三个阶段。这是他寻求救国之路的时期。即由实业救国到抗战救国再到民主救国，其中 1932 年的“淞沪抗战”，虽在经办实业阶段，父亲曾全力以赴，支援抗战。我将它纳入抗战阶段。

第一节 实业救国

离开同济后，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实践他实业救国的抱负。新民机器厂是他亲手创办的第一个工厂。他仅化了几个月的时间，筹集了 2 万 4 千元经费，选定厂址，购地兴建了厂房，向条件较优惠的德国订购了各种工作母机，选聘优秀的骨干人才和 40 余名职工，购置了廿多台设备，于 1922 年元旦就正式开工了。他取“新民”二字的寓意是要走一条兴实业、利民强国的新路。这厂父亲经营了 35 年，直到 1956 年公私合营后，迁至闵行，成为现在航天部新中华机器厂的前身。新民机器厂的艰难历程，相当典型地体现我国民族工业，特别是机器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曲折历程，也生动地说明了一位爱国的民族工业家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在本文中有必要着重介绍之。

新民厂初建时的业务主要为纱厂机器进行维修和生产零件，但这并不是父亲建厂的初衷，他面对维修业务中遇到的刁难和纱厂的不景气，决心闯出一条设计和制造机器的新路。先为勤工机器厂设计制造了机器的挂脚、地轴、皮带盘等全套设备，接着又承制了几台黑色油墨机，后来又设法到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场，偷偷地（因为这台进口新式油墨机是保密的，总经理不同意测绘）在现场把一台德国造的彩色油墨机的样子画下来，按机器的外观，反复研究，设计其内部结构，经过试制和多次修改，终于造出了性能良好的彩色油墨机，从而大大地增强了父亲研制新机器的信心。此后，新民厂就根据市场的需要开展业务，研制了不少新机器，并取得了信誉。例如有一位华侨，是一个木行的经理，他在参观新民厂时说：“我们行里需要许多机器，可惜你们工厂造不出来。”父亲立即严肃地回答：“你要什么机器，我们都

可以造。”华侨想添一部大型立式锯木机，但不相信新民厂能造出来。父亲说：“我不要你的定银，机器造好后，为你安装使用，假使效能和你的外国货一样，你可以照洋货的八折付款，假如不好使用，你把机器砸碎了还给我，你看怎样？”在父亲豪爽而自信的保证下，这笔生意就签订了合同。工人们都知道这台锯木机成交的过程，为给中国人争气，干得十分起劲。试车结果证明，新民厂造的大型立式锯木机性能极好，日产量比外国货增加 5%，而且电力消耗仅舶来品的 80%。木行经理信服了。此后该行添置了圆锯、断锯、行车及花边、插槽、吸木屑等设备。接着，久记木行、顺泰木行、天厨味精厂、康元制罐厂、泰康厂等所需的各种机器都陆续向新民厂订货。一时新民厂名声大噪，南洋的一些华侨也闻名前来订货。

1925 年以后，上海的橡胶工业逐渐发展，橡胶厂的机器原先都从日本进口。义昌橡胶厂（即后来的正泰橡胶厂）离新民厂很近，机器的修配和增添均由新民厂承揽。新民厂最先仿制成功日式的轧胶机、胶鞋车、模子等，促使了国产橡胶机很好取代了东洋货，使得 1928 年以后，上海的橡胶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

此外新民厂还生产过精密度较高的绕钨丝机，连续生产了八部，性能与进口货媲美，而成本和价格只有进口货的 1/4。

新民厂还为大中华造船厂造过 350 匹和 500 匹马力的船用蒸汽机，仿制过多种柴油机发动机。有一种德式小型高速柴油机，新民厂仿制出来的售价仅德国产品的一半，颇受农村欢迎。随着国货的信誉日益提高，德国产品终于被挤出国内市场，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新民厂为了大量生产这种柴油机，专门设计了一种可钻、铣、车、刨多刀多刃同时加工的专用机床，并在唐山路底设立了分厂，职工发展到 300 多人。不料生产准备刚刚就绪，抗战开始，分厂被炸毁。

父亲喜创业，好新奇，常想做一些国内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做好后就交给别人去生产。新民厂的产品品种多、批量小，人家要做什么就制造什么，因此工厂也是一个研究机构，产品不断创新，新民厂依靠能创新的能人，有几个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他们是研制各种机器都能成功的主要力量。

父亲创办的第二个工厂就是合作五金厂。父亲回顾办厂的经历，深深感到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民族机器工业市场狭小而不稳定，因而很难迅速积累资金发展企业。经过对市场情况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凡大批量生产的产品都与日用品相联系。当时我国的建筑与家具五金的社会需要量较大，但国产品都系翻砂后用手工制作，虽价格低廉，但质量粗劣。因此较好的五金产品都是美、德等国进口的。于是他决心开办五金工厂，既可满足国内需求，又可抵制洋货。于是在 1927 年，他筹集了 3 万元资金，在家乡嘉定选择临河水运方便之地，很快建起了厂房，由新民厂为该厂设计制造了各种工作母机和专用设备，制造出各式门锁、抽屉锁、大小拉手、大牵身锁，他们采用新设计、新工艺，产品价廉物美，两年后就在市场上站住了脚，以“CMC”商标行销全国，颇获时誉。以后又生产了各种高级文具和医疗器械。由于产品供不应求，于是又添增设备，扩建工场，除拥有普通金属切削机床外，还有压铸机、冲击机和电镀设备，并能自行发电。该厂逐步扩大，资金增至 15 万元，职工达 300 余人。至“八一三”前“合作五金”已基本上取代了舶来品。

1929 年，父亲用新民厂制造的柴油机，配上华生电机厂的发电机，利用黄渡镇一座废弃的轧花厂房，建造了黄渡电灯公司，白天用于轧花、碾米，夜间用于居民照明，促进了该镇的发展。

1934 年，父亲和几位老同学、老同事一起集资 15 万元，建

起了长城机制砖瓦厂用废煤渣作制砖的主要原料由上海电力公司供应。电力公司本来每月要用轮船将堆积如山的废煤渣装上驳船运至长江口外劳民伤财。而与长城厂签订了长期合作合同后，由电力公司提供厂房，煤渣无偿地用火车运到长城厂内，长城厂则保证使渣堆不再扩大，这样长城厂的厂房与原料问题都解决了，而电力公司免受废渣之累，双方皆大欢喜。同年10月，长城厂开业，先后生产出实心煤渣砖。经过反复试验，各种配方制成的价廉物美的空心砖，坚如水泥，重量不到实心砖的一半。后来又采用机器捣制，产量大增，硬度与刚度也有提高。经建筑部门使用，证明这种空心砖用于十层以上高层建筑效果奇佳。既可节省大量水泥，减轻重量，降低成本，而且具有隔音和隔热的良好性能。上海租界建造高层楼房，纷纷向长城砖瓦厂订货。1935年，父亲又亲自去日本考察墙面砖的制作工艺与销路。回国后，研制成一种大理石式的面砖。可惜此砖未及出售，抗日战争爆发，长城厂也被敌机炸毁。

1936年，父亲在南京中华门外发现一块高地，其土质极佳，极宜制砖，设想取高地之土制坯烧砖，平出的土地再开辟成水田，可一举两得。于是向政府购得该地，建造了一座窑厂，定名为南京石城窑厂，挖好了14只马蹄窑。谁知刚刚试烧了两窑，日寇侵华，整座窑厂就废弃了。

此外，在此期间，父亲还受聘出任信大窑厂和恒大纱厂的经理，也颇有成绩。纱厂因日本帝国主义采用突击收购棉花，再到各产棉区向农民预付款订购田间棉花，造成棉价直线上涨，同时又集中在数天之内的抛售棉纱，使纱价大跌。而我国纱厂各自为政，只好高价抢购棉花，低价销售棉纱。几经反复，上海的大部分纱厂纷纷倒闭，纱厂在花贵纱贱的情况下，多做一件纱便多蚀本一笔钱。开始用信大窑厂赚的钱来贴补恒大纱厂，后来只得将两

厂相继出售。

从 1921 年父亲创办新民机器厂到抗日战争爆发的 10 多年间 在办企业的过程中 他尝试了各种工业生产 创建了五个工厂 摸索出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工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以机器制造工业武装日用品工业，以日用品工业开拓市场，发展生产。他在企业管理上 机构精干 严格规章制度 明确岗位职责，办事不循私情 维护企业信誉。在组织生产中 提倡技术革新 强调按工作好坏、产量高低、质量优劣 实行奖惩 以提高经济效益。他办的厂虽然规模不太大 但生产经营比较灵活 能随着市场的变化 逐步与国计民生的需求相适应 向批量生产发展。但这种发展，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排挤和打击 只能从夹缝里求生存。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机器大量占领中国市场 他们采取技术封锁、压价竞争、设厂竞争和倾销国内工厂设备更新下来的旧机器等手段，使我国刚刚萌芽的民族工业长期不能立足和正常发展。新民厂制造的机器只有比同类外国产品价廉或有所改进才有销路。合作五金的五金产品 为了适应人们迷信洋货的心理 只得先采用‘规矩’商标 不敢标明中国制造 到打开销路后才打出‘合作’商标。长城机制砖瓦厂生产的煤渣空心砖，必须先经英国人设在上海的工部局抽验鉴定，发给证明后 才能在租界的高层建筑上使用。而恒大、德大和厚生纱厂 都被日本纱厂挤垮。这一切 使他深感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实业救国谈何容易。

在上述时期 上海机器制造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 促进共同发展 于 1927 年，在铜匠公所的基础上，同业们集会商讨组织上海商民协会机器同业公会 父亲应邀出席 并即席作了长篇发言 阐述在国际资本倾销产品的情况下 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提出了同业公会的任务和活动办法。他的发言受到铜匠公

所的一些老前辈的极大赞赏。大家因他年轻有为，热心公益，有文化，有朝气，在会员大会上推举为委员，后又一致推举为公会主任委员。于是他盛情难却，挑起了这副重担，以公正无私的精神为大家服务。

铜匠公所原来的组织松散，具有行会的性质，还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在公所的厅堂里，供奉着三尊菩萨：炼丹始祖太上老君、炼钢始祖葛洪和打铁始祖尉迟敬德。因此，他主持同业公会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改造铜匠公所，破除迷信，废弃供奉的三尊菩萨，树立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现代科学技术来发展机器制造业的信心。与此同时，还明确了公会的主要任务，以交流经验，互相合作和调解纠纷为主要工作。公会曾组织各厂之间的工作竞赛，促进了各厂的工作。他在《机器同业工作竞赛会题句》一诗中，表达了对在同业中开展竞赛寄予的希望。诗曰：

国家盛歌基于工，惟勤惟敏我所崇。
竞技有心在强族，夺标无意自称雄。
精求益进程何限，炉锤锻出太平风。

在调解各厂纠纷方面，公会取得不少成绩。同业因业务问题发生争执时，父亲总是耐心调解，秉公处理，妥善解决，避免恃强凌弱，或两败俱伤的情况发生。此外还兴办了一个诊所，为各厂职工和比较贫困者治病，收费极为低廉，受到大家的赞扬。

在公会工作中，父亲得到大家的信任和好评。因而，同业们称他为“机器之友”。公会每两年改选一次，他连选连任主任委员达十年之久。在“九·一八”、“一·二八”和“八·一三”的群众抗日运动中，他依靠同业公会，发动同仁参加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后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工厂内迁，离开了上海。

在这一时期 还有段值得一书的事 因为通过这一件事 使他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启迪。那就是淞沪抗战后,即 1932 年 5 月 5 日 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日军可以永久驻扎在淞沪、闸北、江湾等广大土地上 国民党答应取缔全国抗日运动 并把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时的父亲犹如临头被泼了一桶冷水,一时间若有所失,无心业务 如坐针毡 自感徒有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门。就在这时 陇海铁路管理局发起组织陕西实业考察团 聘请国内实业经济专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组团 分南、北两组分头考察 父亲作为上海市商会代表参加北组,负责工商方面,8月10日,考察团从郑州出发,12日到达西安。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在省府大礼堂欢宴全体团员。北组一行共十九人 从西安出发 途经 20 个县 行程三千里 历时 35 天。考察完毕后 回到西安 向省政府报告考察详情,然后分任务起草报告。父亲负责起草陕北工商方面。并提出了两分建议:一是开煤矿 发展动力工业 另一是开办纱厂与普遍发展家庭纺织业。他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但这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因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这些建议也就束之高阁了。但是在这次考察中 父亲最大的收获却是在思想上得到了新的启迪。

8月底,父亲一行沿洛河东行,中午在黑家堡打尖。村上老百姓因为看到护送考察团的军队 吓得都跑光了。父亲很想和当地的农民聊聊 作些调查 便派人去找 找了半天 只找到三个上了年纪的老汉。父亲十分高兴 拿出随身带的酒菜 请他们一起吃喝 边吃边喝地随便谈了起来 谈得十分融洽。忽然,一位老汉放下酒杯 郑重地问:“你们是红军吗?”父亲耐心地解释说 他们不是红军 不会伤害你们的。老汉们面面相觑 终于一位老汉又望着父亲说:“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红军。”父亲又再三说明他们不

是红军。这时三位老汉同声地说：“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父亲听到老汉们真诚朴实、异口同声的话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过去在国民党的宣传中，红军专门杀人放火，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全然不讲道理的。可是在这里亲自见过、接近过红军的普通老百姓、老农民的心目中，红军却是爱护百姓，造福人民，受到爱戴的仁义之师。因此在父亲心中觉得其中必有道理，今后要留心对中国共产党多加观察，不可轻信国民党的宣传。这是父亲开始认识共产党的一次难忘的印象。后来，他组织工厂内迁，在汉口他遇到老友范长江，向他介绍赴延安亲见共产党的清正廉洁，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和高昂的抗日热情后，不禁心向往之。正好他的一位侄子胡世高无所事事，长城砖瓦厂里的工务副主任郑汉涛则表示想去解放区，他就通过范长江将他们介绍给中共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张子华。临别时，他还挥毫赠送郑汉涛一首诗：世事乱如麻，西北生彩霞。东南有郑子，内实而外华。心焉向往之，不惮阻且赊。壮哉誓茹苦，为国以忘家。志哉勿自堕，种瓜以得瓜。

第二节 抗战救国

日寇的侵华战争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开始，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袭击沈阳，并向东北大举进攻。至次年初，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见此惨状，父亲在 1932 年元旦写下了“伤强邻瞰视而不察也”一诗表示了对祖国的安危的深沉忧虑。诗曰：

众人昭昭兮，我独浑浑。
众人察察兮，我独昏昏。

举世皆优游，我东望而愁增。

不到一个月，1月28日深夜，日寇在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大举入侵，驻沪的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入侵之敌，开始了著名的“淞沪抗战”。父亲由忧愤化为杀敌报国的激情，主动与十九路军取得联系。父亲与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翁照垣旅长早有交往。当时翁旅长所部驻守吴淞口、虹口和闸北一带，首当其冲。他率所部，几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当时日军装备精良，大多为重武器，且配以装甲车。十九路军的武器装备极差，大多为老式的汉阳造的“七九”步枪，其他武器极少，而且弹药供应十分困难。父亲得知这情况后，立即与翁旅长取得联系，并与同业公会有关人士研究后，决定组织弹药生产。他们将一些易于迁移的灵便小车床、钳工台和各种加工工具，运至沪南集中，抽调工人，建立起临时手榴弹工场；委托中华铁工厂王佐才组织生产。工人们轮班生产，日夜苦战，赶制了一批手榴弹送往前线。根据前线需要，还制造了地雷和攻击装甲车的穿甲弹。

一天，上海兵工厂厂长阮尚玠找到父亲，要求机器同业公会支持兵工厂完成承制迫击炮弹的任务。父亲立即通知同业公会组织了40余名优秀的翻砂工人前往支援，使该厂日产量一下子增加了五倍。保证了炮弹的供应。

十九路军在上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英勇抗敌，粉碎了日军扬言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使其妄图速战速决，一举占领工业重镇上海的狼子野心遭受重挫。日军死伤万余，三易主帅。司令官由盐泽少将换成野村中将，接着又换成了白川大将。

父亲还参与密谋炸毁日本海军第三战队的旗舰“出云舰”，排水量为9800吨的日本海军第三战队的旗舰“出云舰”是在沪作战日军的一个指挥部。它原是日在沪作战海军司令野村中将